

政治文化背景下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

张建华

内容提要：苏联政治文化谱系包括主流的苏维埃文化和非主流政治亚文化两部分，也即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苏联知识分子身处两种政治文化的变迁之中，在适应其群体和个体生存的公共空间中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想。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文化的位移，知识分子对待苏联体制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

关键词：苏联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公共空间

作者简介：张建华，1962年出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俄国思想史、苏联政治史和苏联知识分子问题，中俄（苏）关系史。代表著作：《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路标为界：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联系方式： 邮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邮编：100875。电话：010-62276916（宅），13701356373。
电邮：zhang.jh171@sohu.com。

一、苏联知识分子辩

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或 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①概念的生成和流变有一个较复杂的过程。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②然而“知识分子”概念的成熟却是较为晚近的事。^③“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来源于拉丁语“Intellegens”，其含义为“理解的”（понимающий）、“思考的”（мыслящий）和“理智的”（разумный），其动词“Intellego”的含义相应为“理解”“思考”和“感知”。古罗马时代著名思想家西塞罗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将“Intellegen”的含义扩展为“Intellegentia”，意思为“理解能力”。随后“Intellegentia”的含义在后人使用时再度加以扩展，其含义包括：其一作为名词使用，即“解释力”、“理解力”、“认识力”和“认知力”等；其二包含动词意义，即“理解”“思想”和“辨别”等；其三外延为指特殊技能，即“能力”、“技术”和“方法”等。在1725—1750年间，俄国著名学者特列基亚科夫斯基将拉丁语“intellegentia”以意译的形式翻译为俄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将该词的含义解释为“理性”（разумность）。后来到1819年，彼得堡大学教授加利奇在编辑《哲学辞典汇编》时将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6-2009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项目（NCET）“苏联政治文化谱系研究”。

^①中国学者通常把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译为知识阶层，以强调其共同使命，强调它是一个知识人组成的共同体。将интеллигенты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译为知识分子，强调其职业特征和教育特征。

^②当代俄罗斯学者（如利哈乔夫、康达科夫、谢缅尼科娃等），西方学者（如柏林、派普斯、拉伊夫等）和中国学者（如姚海、朱达秋、李小桃和笔者本人等）均持此观点。相关详细介绍参见：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6-78页。

^③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在俄国最古老的，成书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达里所编《大俄罗斯活语详解辞典》（Даль В.И.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网络版中未见其词条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俄罗斯历史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分子学

（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едение）。其重要标志是从20世纪9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公布了大量相关档案，出版大量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并且在高等学校和科学院以苏联知识分子为题的学位论文数量大大增加。参见：Какоурова Н.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Сибири в 20-е - начале 1930-х гг. :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 Сибир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3. № 2.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收入，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学说将其解释为“理性精神”和“高级意识”。^①俄国文学家舍尔古诺夫(Н.В.Шелгунов)也主张将俄国知识分子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和“理智力”。^②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政治和社会活动影响的扩大，“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便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广泛使用了。

伴随着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剧烈的政治转型与社会变迁，伴随着由“帝俄”时代向“苏联”时代的转换，伴随着政治建构、社会建构和更为深远的文化革命，知识分子概念无论就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已不限于19世纪以及十月革命前纯思想(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和智识(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领域，伴随着俄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转型，知识分子概念在学科领域、职业范围、地区分布、民族属性等方面都有广泛的扩展，即经历着多元化、技能化和职业化的过程。

旧俄知识分子的转型、从工人农民中培育新型知识分子以及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本身就是文化革命的关键内容和重要成果。著名历史学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色教授学院首任院长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院士在1928年宣布：“我们已经进入需要苏维埃政权所承认的学者的时代，……现在我们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者。”^③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④它意味着，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结束，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界经常混用“苏联知识分子”和“苏维埃知识分子”两个概念。准确地讲，“苏联知识分子”概念宽泛，包含了苏联境内所各种职业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乃至苏联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内涵较窄，专指拥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而且，“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在苏联早期，既知识分子群体转型和角色建构时期具有特别的意义。

二、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

“公共空间”(英语publicsphere/德语Offentlichkeit)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强调“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17、18世纪初现于英国和法国，19世纪盛行于欧美。初时是市民间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场所，后转型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议政和参政的民主渠道。“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⑤所谓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结构转换，即是由文化公共领域转向政治公共领域。“参与讨论的公众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这样一个过程表现为已经具备公众和论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转换。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⑥

几乎与哈贝马斯同时，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知识分子生活的场所”(Settins for intellectual life)概念。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知识分子需要听众，需要有一批人听他们宣讲自己的思想，并对他们表示认可。……第二，知识分子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同行接触，因为只有通

^①Кондаков И.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М., 2003. С.247-248.

^② [俄]泽齐娜等著：《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③ Вес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32. №4-5. С.47.

^④ [苏]《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根本法)》，莫斯科：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47-57页。

^⑤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⑥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过这种交流，他们才能建立起有关方法和优劣的共同标准，以及指导他们行为的共同规范。”他还详细地规划了 18 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中常见的八种制度化的环境：沙龙和咖啡馆，如著名的巴黎的左岸咖啡馆，科学协会或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波希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这八种制度有一种共同特点，虽然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利用程度不同，它们都对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职业的形成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①

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关心社会、批判现实、监督政府。1896-1906 年围绕德雷福斯案件 (Affaire Dreyfus) 而引发的法国知识界的群体政治表达，即是哈贝马斯断言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由文学公共领域转向政治公共领域的典型例证，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 (Emile Zola) 发表致法国总统福尔 (Francois Félix Faure) 公开信《我控诉》(J'accuse) 之后，这场由法国知识分子发动的抗议活动随即演变成广泛的社会运动，并迫使法国最高法院于事发 10 年后宣布德雷福斯无罪释放并恢复名誉。

苏联知识分子的合法的公共空间包括：

出版社和书刊出版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一度放松了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1921 年 12 月颁布《关于私人出版社》(О част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х) 决议，规定开设私人出版社，由此引发私人出版社和社会政治和文学批评杂志的数量急剧上升。仅 1921 年头 7 个月，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就分别开办了 200 家和 99 家私人出版社。这一政策到 1925 年就被废止。所有的出版社、印刷厂以及图书杂志发行均由国家控制和经营。

苏联早期杂志《红色处女地》(красный новь)、《在岗位上》(на посту)《在文学岗位上》(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等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50 年代中期后，随着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冻”，苏联的公开报刊数量大大增加。较有影响的杂志包括，文学艺术类：《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十月》(Октябрь)《星火》(Огоне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азете《旗帜》(Знамя)《外国文学》(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苏联艺术》(Совет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时事政治类：《科学和宗教》(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社会科学和现代》(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国际生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жизнь)《劳动报》(Труде)《女工》(Работница)《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消息报》(Известие)《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红星报》(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讽刺类：《鳄鱼》(Крокодил) 等等。还包括大量的学术类杂志：《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祖国档案》(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民族学评论》(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国家与法》(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经济问题》(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心理学问题》(Вопросы психологии)《社会学研究》(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报刊杂志是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作品、著述和研究心得的重要场所，从苏联报刊历史中也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风潮。

爱伦堡 (И.Г.Эренбург) 因一本书而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解冻》(Оттепель) 是于 1954 年 5 月恰逢其时般地发表在《旗帜》杂志上并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的。索尔仁尼琴 (А.И.Солженицын) 第一部“集中营文学”《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是在赫鲁晓夫 (Н.С.Хрушев) 和《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 (А.Т.Твардовский) 的支持下，首发于《新世界》(1962 年第 11 期) 上。

社会团体、文艺团体和学术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部分旧俄的社会团体被解散、关闭或停止活动，以彼得格勒为例，1918—1920 年 500 个革命前的社会组织仅留存 50 个。^②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前成立的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社会互助、工会和合作社领域等 60 多个著名的组织还

^①[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第 3-4 页。

^②Купайгородская А.П., Лебина Н.Б. 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Лениграде в 1917-1937 гг. Ленинград, 1989. С. 8.

在继续活动。至 1928 年 1 月，共有 4577 个合法的社会组织，参加者近 143 万人。^①在苏联的社会团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术、科学和艺术组织，如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РАПП），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Сер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拥有特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苏联作家协会”，始建于 1845 年的“苏联地理协会”（原名“俄国地理协会”）^②，“苏联记者协会”，“苏联哲学协会”，“苏联教师协会”，“苏联历史学家协会”“苏联作曲家协会”，“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普希金之家”等等。到 90 年代初，苏联有各种社会团体 9 万个。^③

上述团体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如苏联作家协会、苏联历史学家家、苏联哲学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盛况空前，每次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做重要讲话，往往还邀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欧美国家进步人士参会。以至于爱伦堡在准备参加 1934 年召开的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即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时，感到“我像第一次去参加舞会的姑娘那么激动，所有的作家都将欢聚一堂，并将开始一场关于艺术的坦率而严肃的谈话，这准是一桩大事。”^④代表大会一连开了半个月，“每天清晨，当我们匆匆赶到圆柱大厅的时候，入口处总是簇拥着一群以一睹作家们的风采为快为莫斯科市民。”并且代表大会最终“变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⑤1967 年 5 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А.И.Солженицын）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遭到苏联政府的迫害。由此可见苏联作家的社会地位以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政治影响力。

此外，苏联有大量的文艺团体遍及各地。一般在较大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高尔基、基辅、明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都设有芭蕾舞剧院、讽刺剧院、歌剧院、青年模范剧院、儿童剧院、滑稽歌舞剧院、大马戏团和犹太国家剧院（1949 年莫斯科及全苏各地的犹太国家剧院全部被关闭），在哈萨克、乌克兰、吉尔吉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加盟共和国还设有民族语言剧院、舞剧院等文艺团体。这是表演艺术家们进行艺术交流和政治信息交流以及政治情绪表达的公共空间。

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各种政治性极强的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正如俄罗斯社会学家斯克沃尔采夫所指出的，“第一批真正的非营利组织（即不是根据上级的命令，而是根据公民倡议建立的组织）早在 1988-1989 年间就出现了。”^⑥而这些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苏联危机的关键时刻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苏联是当今世界上高等教育和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许多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至 80 年代末，苏联有高等学校 883 所（其中综合大学 66 所），学生 500 多万人。至解体前的 1991 年，苏联高等院校有教学和研究人员 3.3172 万人，占全国科研人员总数的 6.8%；有科学博士 0.1686 万人，占全国科学博士总数的 8.6%；有科学副博士 1.1747 万人，占全国副博士总数的 12.6%。^⑦

苏联科学院是苏联最高科研机构。它有着学科分工和科学领域极其细致的机构设置。1959 年，苏联科学院设有 9 大学部，其中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学部有 5 个，即：物理和数学部、化学部、地质学和地理学部、生物学部、工艺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有 4 个，即：历史学部、经济学部、哲学和法学部、文学和语言学部。1963 年调整为 16 个学部，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仍然为 4 个。到 70 年代，苏联科学院共有 70 多个各类科学机构。截止 1975 年 1 月，苏联科学院各机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 15 万人，其中科学家约 39000 人。至 1981 年 1 月，苏联科学院有院士 234 人，通讯院士 498 人，外籍院士 80 人。其中，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37 人，通讯院士 73 人，外籍院士 7 人。

^①Ильина 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1920-е годы.М.,2000.С.101,104.

^②1991 年苏联剧变以后，苏联地理协会更名为“俄罗斯地理协会”。

^③黄立菲：《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4 页。

^④[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冯南江等译，下卷，海南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 页。

^⑤[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冯南江等译，下卷，海南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29 页。

^⑥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4 页。

^⑦张建华主编：《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印 2002 年版，第 112 页。

仅历史学部就设有以下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苏联史研究所；斯拉夫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米克卢霍-马克来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同时下设学术委员会：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委员会；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学术委员会，社会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东方学学术委员会，斯拉夫学学术委员会，苏联外交学术委员会，科学史学术委员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学术委员会，历史地理学和制图学学术委员会，考古学学术委员会，国民经济历史科学数据委员会，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一般发展史和特殊发展史学术委员会；宗教在历史中的作用学术委员会；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学术委员会；苏联与世界经济史问题学术委员会；历史编纂学和史科学学术委员会；历史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学术委员会；古文献学、档案学和历史——语文邻近学科委员会；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应用委员会；纹章学委员会；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斯拉夫文化研究与普及学术委员会等。

除苏联科学院外，还有苏联农业科学院、苏联医学科学院、苏联艺术科学院和苏联建筑科学院等。苏联很多党政部门和国家职能机构也设有科学院所，如苏联国防部下设军事历史研究所、苏联外贸部下设对外贸易研究所、苏联教育部下设教育科学研究院等等。

1980年，全苏各类各级科学院、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工作者近140万人，科学博士近4万名，副博士近40万名，科研人员中有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及资深专家27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多的学者同时身兼科学院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如国际逻辑学界著名的“莫斯科方法论小组”的创始人、后来成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代表的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既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和教授，又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种工作形式既有利于学术交流，也利于知识分子交流政治思想。上述科学机构、高等学校、学术团体以及书刊出版物是苏联知识分子展现自己智慧和创造力并以此获得生活来源的工作空间，也是具有知识分子特点的合法的公共空间。这里既是知识分子之间交流科研和创作经验的场所，也是合法表达政治愿望和传播政治信息与社会情绪的重要场所。

另外需要提及的一个概念是首都知识分子(столич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及其公共空间。历史上的莫斯科(1918年苏维埃政治中心回迁莫斯科)和彼得格勒(1924年后更名列宁格勒)即是俄国的两大都城和文化中心，十月革命之后仍然扮演着苏联政治中心和文化首都的角色，这里聚集着苏联科学院(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莫斯科大学(МГУ)、列宁格勒大学(ЛГУ)等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莫斯科大剧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большая театра)、马林斯基剧院(Марианская театра)、俄罗斯博物馆(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莫斯科音乐学院等艺术创作、教育、研究和展览机构以及国立列宁图书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ени В.И.Ленина)^①、《真理报》(Правда)、苏联通讯社(Тасс)^②等众多的文化机构。因此，毫无疑问在这两座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全苏知识分子中占有绝对的比例。

《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十月》(Октябрь)是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作家柯切托夫(В.А.Кочетов)。60年代中后期，持自由立场的《新世界》杂志与持保守立场的《十月》杂志之间就文学创作问题和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展开了持续近五年的争论。两家刊物不仅发表倾向不同的作品，而且还不断刊载理论文章，在一系列文学问题上展开争论。如：《新世界》反对“粉饰现实”，要求“忠于生活”，真正体现大众的感受，多写“小人物”和“普通人的生活”。《十月》则反对“战壕真实派”，坚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传统创作理念，批评“自我表现”是资产阶级颓废的文艺情调，强调“时代英雄”的教育作用。因为《新世界》代表了新的文学思潮，因而在论战中受到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① 原为1862年建立的鲁缅采夫公共图书馆，1925年改此名。

^② 原为1917年11月18日成立的俄国彼得格勒通讯社。1918年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新闻局合并，命名为俄罗斯通讯社，简称罗斯塔。1925年7月10日改名苏联通讯社，简称塔斯社。总社设在莫斯科。

和支持。然而，这场争论最后是在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的干预和压制下结束。

恰尔马耶夫(В.Чармаев)在《青年近卫军》(1968年第9期)上发表了《伟大的探索》(Великое искание)和《不可避免性》(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文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由反西方的立场引申出对“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随后《青年近卫军》《我们同时代人》(Наш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等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持赞同或反对观点的文章，最终的论战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先后有政府要员、工人代表、劳动英雄等阶层人士参与论战。论战的焦点是如何理解“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传统”。杰明捷耶夫(А.О.Дементьев)在《新世界》杂志(1969年第4期)上发表了《论传统和人民性》(О традициях и народности)，文章围绕对“爱国主义”概念的理解发表意见，认为“爱国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有“争取解放斗争的爱国主义”，也有“护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他提出应该“把保卫祖国独立的正义战争与沙皇的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区别开来”，他称恰尔马耶夫的语言是不折不扣的“斯拉夫优秀人种论的语言”。^①然而杰明捷耶夫的文章在一片沙文主义欢呼声中成为“不和谐的”声音，他们的观点受到了众多学者和群众的批评。《社会主义工业报》(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дустрия)上刊登了苏联劳动英雄扎哈罗夫(М.И.Захаров)给《新世界》杂志的《公开信》(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以俄罗斯工人的名义要求杰明捷耶夫对自己的言论做出“党性的回答”，^②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因发表杰明捷耶夫文章而受牵连的《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被迫辞职。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历史学博士雅科夫列夫(А.Яковлев)在《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72年11月15日)上发表题为《驳反历史主义》(Против антиисторизма)的长篇文章，批评了索尔仁尼琴和恰尔马耶夫等人宣扬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谴责他们的思想是“用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代替民族自豪感，将爱国主义变成了沙文主义。”认为他们是“美化专制制度下俄罗斯的生活、风尚和习惯”，是“公开敌视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表现。”^③但是也因此而得罪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头们，违背了苏共中央的有关指示，最终被免去意识形态部门的重要职务。

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特殊公共空间

当代俄罗斯学者别达(А.М.Беда)将政治文化定义为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与现存社会关系的协调共处。在其论著中政治文化被划分为主流政治文化(Общая культура)、非主流政治亚文化(Субкультура)和反政治文化(Контркультура)。^④主流政治文化实际上是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政治文化，即苏联政治文化的主流。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但是服从行政当局的政治文化类型，别达将其称之为非主流政治亚文化。别达认为，与主流政治文化截然相对的是反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之下，公民在地下积极反对官方主流的政治文化，并形成一股政治潜流，而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发展导致了苏联主流政治文化的溃败。

另一位当代俄罗斯文化史学家格奥尔基耶娃(Т.С.Георцева)也认为：“苏联时期的文化是一个复杂而辩证的整体，文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统一的，也是不平衡的，整体体系及其各个要素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充满活力的全人类的特点与极权主义莫名奇妙地并存共依。”^⑤她提出的观点也包含了苏联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中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因素。

在苏联，制定政策与法令的权力全部集中在党政机关手中，尽管宪法规定苏联公民可以公开表达民意与政治诉求，但公开表达民意的公民的实际权利和民意的送达程度是受限制的。实际上普通公民在当局设置的各种羁绊与政治高压之下，对政治往往有一种抵触抗拒与恐惧感，不敢公

^① Дементьев А.О. О традициях и народности //Новый мир.1969.№.4.

^② Захаров М.И.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дустрия.1969.31.июля

^③ Яковлев А. Против антиисторизм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5 ноября 1972 г.

^④ Беда А.А.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МВД (1946-1958).М.,2002.С.1-5.

^⑤ [俄]格奥尔基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41页。

开对党政机关的行政作为妄加评论，因而漠不关心政治或者顺从当局的一切决定，或者采取反政府和反主流政治文化的行动，建立或传播非主流政治亚文化，就是苏联公民的个人选择。

在苏联时期，尤其是 70 年代以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特殊的“公共空间”和特殊的“政治表达”方式。即遍及全苏并且与国外政府或团体保持密切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地下出版物。

在俄语中，有 *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 和 *Диссидент* 两个词表示“持不同政见者”。*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 由 *иначе*（不同的）和 *мыслящий*（思想者）两部分组成，即“异议者”或“异议思想者”。*Диссидент* 是外来词，原意是叛教者或异教徒。在 1965 年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后，苏联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分子往往被称为“*Диссидент*”，与英语中的“*Dissident*”一词相对应，这是苏联官方对上述人士的称呼，一种说法是有意将其视为西方国家的走狗，所以用一个与英语或法语相对应的俄文词来称呼他们^①。持不同政见者在指称自己时基本都使用 *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以强调自身和该群体的特殊意义。在现有的相关研究著作，这两个词多见混用，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使用 *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 来指称“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议思想者”较多。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认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依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② 另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则认为，“在本质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精神、心灵和道德上的反对派，反对谁？不是从总体上反对苏联制度，但反对苏联社会中的思想统一化和对思想的扼杀。”^③ 按照这两个定义，“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涵盖十分广泛的概念，它是指一个极其庞杂的社会政治集团

秘密集会和公开示威既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共空间和也是他们特殊的政治表达方式。秘密集会大多以诗歌朗诵和文学阅读、近郊或长途旅游进行。公开示威则往往是以飞行集会的突然方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中心区域举行。

1965 年 12 月 5 日（苏联宪法日），200 多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要求公开审判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逮捕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968 年 8 月 25 日，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活动，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5 年 10 月 17 日至 19 日，由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А. Д. Сахаров*）和国际人权组织提议，在丹麦国会大厦举行了有关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萨哈罗夫听证会”，会上有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等 10 余个民族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言。1987 年 6 月 14 日由人权组织“赫尔辛基——60”领导，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组织了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活动，要求苏联政府履行 1975 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结束官方的俄罗斯政策，释放拉脱维亚人权活动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上述活动往往由一地扩展为全苏，其影响由国内扩展至国外。

苏联时期涉及地下出版物常见两词——*самиздат* 和 *тамиздат*。*Самиздат* 可直译为“自我出版物”，指的是知识分子或其他阶层人士在民间不合法地使用简陋的印刷机器刊印和复印的出版物或与之相关的印刷品。*Тамиздат* 可直译为“那边出版物”，指在国外出版发行后运回国内的苏联地下出版物或与之有关的印刷出版物。但一般情况下，两者混用，并统称“地下出版物”，国内学界将二者分别音译为萨密兹达和塔密兹达。

“地下出版物”实际上包括一个庞大的不合法的，地下编辑、印刷、发行和流通体系，它拥有固定的作者、编辑人员、印制人员、各地及国外的发行人员以及印刷、出版和发行资金的提供者。在 70 年代以后的苏联，地下出版物在苏联非主流政治亚文化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异议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异议诗人布罗茨基，异议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阿夫托

^①[美]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等著：《克格勃绝密档案》，王振西等译，下册，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0 页。

^②[苏]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译，群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

^③Ушаков А.В. и др.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 М., 1999. С.437.

尔哈诺夫，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和“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等人的作品和著作都是通过“地下出版物”体系在国内秘密传播的。甚至赫鲁晓夫临终前口述完成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是通过这个渠道辗转流传到国外出版，因此受到苏联政府的批评，他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回忆录是假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出版物体系充分占据了“第二种文化”——非官方文化，即非主流的政治亚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维持着一种对抗状态。

四、苏联政治文化谱系的演变与苏联解体

当代俄罗斯学者别达（А.А.Беда）在《苏联政治文化：以 1946-1958 年的内务部为对象》一书发现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

见下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别达统计和分析：从 1899 年到 2006 年这 108 年每 12 年为一个发展周期，共经历 12 个发展周期。其中从帝俄到苏联再到当代俄罗斯共经历了 9 个历史周期。每个周期都有自己的历史主题，在该周期的第 7 年是高潮与转折年，在这一年左右会发生重大历史事件，1905 年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1953 年斯大林逝世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恰好位于每个高潮和转折年份上。以 1923 年到 1934 年为例：别达在其论述中将 1923 年到 1934 年这 12 年间的历史发展主题用“劳动”来概括，因为在这一时期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此一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工农业劳动竞赛、斯达汉诺夫运动等活动，在第 7 个年头即 1929 年以“劳动”为主题的活动到达高潮后开始衰落，到 1934 年结束。随后苏联国内活动的主题开始转向“体育竞赛”并在 1941 年达到它的顶点。而 1947 年到 1958 年苏联国内的历史主题便是通过历史题材“宣扬爱国主义，展开以切断国内外交往和联系为目的的反‘卑躬屈膝者’运动，反‘无爱国心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运动，并借“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与“医生阴谋”案件来震慑苏联国内的犹太人，这些被统称为战后意识形态批判的运动在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前夕达到了顶点。随着斯大林 1953 年 3 月 5 日去世，这一意识形态批判运动迅速降温，并随后出现了苏联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解冻”时期。^①

从别达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时期，的确存在政治文化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现象，并且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极其明显。

苏联政治文化谱系包括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和非主流政治亚文化两部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主流文化是苏共提倡的文化取向，对内即建立在共产主义目标和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苏维埃文化”，对外即建立在国际主义原则和世界革命理想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非主流文化是 20—40 年代反共反苏势力、60 年代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 80 年代“民主派”提倡的政治文化，其政治取向或者是君主主义的、或者是民族主义的，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

^①Беда А.А.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МВД (1946-1958). М., 2002. С.2-8.

的、或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

如果我们将苏联的主流政治文化解释为一种官方态度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官方态度并不是相对固定的，它跟随政治运动的变化而具有一定的摇摆性。这种状况在苏联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可以用“形势”二字来概括。苏联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这种“形势”的变幻让各级党政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都不得不置身其中，一般人很难脱离政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是主流政治文化和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是主流政治文化对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压服。

然而苏联政治文化谱系下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博弈并非是一劳永逸，也就是说主流并非永远居支配地位，非主流并非永远居无足轻重地位。两者关系和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并随历史形势变化而不断变化和位移。在苏联历史上，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作用，两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不尽相同。20-30年代是主流文化酝酿时期，50年代初是主流文化形成时期。70年代中期前，主流政治文化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使苏联政治和社会基本平稳发展。70年代中期，非主流政治亚文化影响加大，至80年代中期成为苏联社会终居支配地位的主流政治文化，而原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降身为非主流的政治亚文化。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现了“回归文学”“回归史学”和“回归哲学”热，20—30年代流亡欧美的俄国作家以及70年代后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得以在苏联公开出版。俄罗斯宗教哲学热席卷苏联社会，短时间内，出版了大量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著作，开展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也出版了研究专著，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现了别尔嘉耶夫热，宗教哲学热。80年代，历史学和哲学成为变化最为急剧的两个人文社会学科。在“填补历史空白点”口号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历史热。封建主义时期和苏维埃政权早期被封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被大量出版，持不同政见者的历史学著作成为出版社的热门选题，被封禁多年的历史影片得以公映。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在重新反省60余年苏联历史的发展，而且政治学家、档案学家、经济学家、诗人、作家、戏剧家等都投身到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浪潮中。报纸、电视、电影等媒体大量发表和公布历史档案及历史评论，批判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是列宁时期的苏维埃政权的僵化和异化。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评价的：“这是多么令人奇怪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①

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开始更多地从“人”而不是“歌颂”的角度进行自己创作和研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口号的影响下，思想文化文界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一些学者通过作品和研究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70年苏联历史发展的巨大成就，否定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80年代后苏联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首先表现为苏联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的合法性危机，而在苏维埃文化的合法性危机中，首先反映为苏联知识分子对这种长期居于领导和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的认同危机。随着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与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奇异位移，苏联大厦将倾为时不远了。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of Soviet intellectual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Zhang Jianhua

Abstract: The Soviet pedigree of political culture consists of Soviet mainstream culture and sub-mainstream culture(mainstream ideology and sub-mainstream ideology). Soviet intellectual between

^① 徐向梅：《著名历史学家丘巴里扬谈俄罗斯的历史学危机》//《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3期。

two kinds of political culture expressed their political ideas and ideals in the public sphere corresponding with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s. With the migration of Soviet mainstream political culture and sub-mainstream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middle of 1980s,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attitudes of intellectual towards the Soviet system.

Key words: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intellectual, political dissident, public sphere